

中国金融资源贫富不均：穷人去存款 富人忙贷款

银行热衷“傍大款”

就在去年银根紧缩，小微企业贷款陷入困境的时候，以五大国有银行为首的中国银行业却交出了一份令人羡慕的成绩单。与银行业利润大幅增长相反的是，在政府和监管部门连续数年督促银行支持小微企业的背景下，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依旧未能得到根本性缓解。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调查报告》显示，90%以上的受调查民营中小企业表示，实际上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全国民营企业 and 家族企业在过去 3 年中有 62.3%的融资来自民间借贷。

一位银行客户经理坦言：“放一笔 50 万元的贷款给中小企业和放一笔 5 亿元的贷款给大企业，成本是一样的。谁不喜欢发展大客户呢？”即使是银行对中小企业所定的贷款利率比大企业要高，但因为大企业贷款量大，银行从中可以获得的绝对收益要高很多。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信贷管理部副总经理聂大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小微企业融资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抵押担保难。而且，当前小微企业正处于由小到大的艰难盘活期，抗风险能力较弱，经营规模较

编者按：自去年下半年，温州民间借贷事件所引发的问题一度引起了公众对金融改革的呼声。近日，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有关消除金融资源分配不均、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垄断领域的讨论，再度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普通民众如何才能享受更多金融服务？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困境为何一直难以解决？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小。

穷人去存款，富人忙贷款。金融资源的分配不均，两极分化，同样体现在普通储户身上。越富的人越有信用获得资金，变得越来越富，而普通居民因为没有担保和信用记录，想融资创业和发展，便只会招来银行的白眼。有专家认为，这种金融资源的“冰火两重天”，是制度的不公

和程序的歧视，将加剧社会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

建立“草根金融”服务民众

“温州民间借贷风波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前‘两多两少’的尴尬局面。”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表示，民间资本多而投资渠道少，民营企业多而信贷融资少。为追求更高的收益率，大量资金流向民间借贷领域。从民间资金需求来看，借贷主体多是中小企业，它们在正规金融体制内融资困难，不得不向体制外寻求融资。

此次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将“草根金融”逐步引入金融体系，无疑是对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有益尝试。辜胜阻表示，其最大的突破是打破银行垄断，重构竞争有序的金融生态。

怎样才能让普通居民享受到除了存款之外的更多金融服务？国家开发银行顾问、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会长刘克崮认为，构建和发展草根金融体系，全面提高城乡基层金融的整体服务能力，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小微企业及个体户、农户是我国的微经济体系，对于微经济体系就应该有专门的草根



金融机构为其服务。只有建立起分层次的金融体系对应多层次的经济体系，才能更好地为小客户和实体经济服务。

打破垄断是根本途径

事实上，造成目前金融资源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是由我国金融体制所决定的，国有银行目前居于金融业的主导地位，金融资源的占有、分配高度集中。目前，在我国银行业资产总额中，中农工建交 5 家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超过一半，国有大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二者合计占新增贷款的比例经常在 80%以上。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银行业在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到核心作用，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资金的 80%都靠银行贷款，如果银行不贷款，经济增长就会存在困难，但

银行业对经济引领的作用没有更好发挥出来。

“目前是打破银行业垄断的最佳时间窗口。”财经评论员马光远认为，现在中国银行业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大量的设立金融机构，降低金融业的门槛，鼓励民间资本设立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即使发生一些风险，按照中国金融业的现状，我们也有承担这种风险的能力。

“要使金融业更好地服务普通民众和实体经济，首先要增加‘毛细血管’。”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首先是放宽中小金融机构的准入，以此来增加中小金融企业发展的动力；第二是要做一些中小融资的创新；第三是鼓励中小企业的资本性融资，增加它的负债能力和强度。

(摘自《人民日报》)

内地开放指数 沪京粤排前三

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召开前夕，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在博鳌发布《中国区域对外开放指数研究报告》，首次公布了中国大陆地区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对外开放度的得分和排名。根据报告，上海、北京、广东位居排行榜首位，而贵州、青海和西藏则排名垫底。

排名反映区域发展不平衡

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总监刘建兴介绍，中国区域对外开放指数包括三个一级指标，分别是经济开放度、技术开放度和社会开放度，其下再设 9 个二级指标和 30 个三级指标。排名的满分为 100 分，得分越高则开放度越高。

根据排名显示，上海的开放度最高，为 84.7 分；北京屈居第二，为 68.1 分，广东紧随其后。而排名垫底的贵州仅得 3.4 分。对此，刘建兴解释称，这并不代表上海的开放程度是贵州的近 25 倍，得分只是用来度量区域之间进行比较时的相对位置。

报告还将排在前十位的地区划分为“金牌省市”、“银牌省市”及“未来之星”；此外，在四大“经济圈”排名中，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开放程度最高，环渤海地区次之，川渝地区与上述区域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北京经济开放度不如上海

报告显示，在上海、北京、广东三个“金牌省市”中，北京在“社会开放度”上与上海相当并高于广东，“技术开放度”则领先其他两地，显示了北京作为全国科技、文化中心，在技术获取、科研成果国际化等方面的优势。但在“经济开放度”上仅得 51.6 分，远远落后于上海(99.3 分)，也与广东(68.1 分)有一定差距。

报告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可能因为北京主要作为中央企业总部所在地，外资或外向型企业没有特别的优势。报告建议北京未来应注重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提高经济外向度。

“麦当劳数量”成考量标准

记者在报告中发现，报告中一些三级指标的设置很有意思，比如在“社会开放度”中的“文化交融”下，就列出了如“每万人肯德基麦当劳 24 小时营业门店数”、“每万人涉外及港澳台居民登记结婚的比例”等看上去并不那么“严肃”的考量标准。

对此，刘建兴表示，该报告每一个指标的选择都是经过严谨论证的。目前大量的研究显示，肯德基和麦当劳作为美国快餐文化的代表，正在对中国的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而根据社会学理论，通婚是人类文明交流中最重要的显性方式。

(摘自《新京报》)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 年 12 月底，我国外储为 31811 亿美元，比 11 月底的 32209 亿美元，减少 398 亿美元，自 1998 年以来首次季度下跌。

在外界看来，外储的大幅下降反映出，在投资者担心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开始质疑人民币升值空间还有多大之际，去年第四季度已经出现资本外逃的迹象。

14 年以来外储首次季度下降意味着什么？

尽管国家外汇管理局在随后的解释中称，数据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发生在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已经成为既定事实，并且这种现象正在对处在上升期的中国经济产生潜在的风险。

根据招商银行联合贝恩公司发布的《2011 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

警惕中国资本外逃

示，2011 年，中国拥有可投资规模在 1 亿元以上的企业主中，近 30%已完成投资移民，另有 47%正在考虑移民。

这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正常现象，因为不仅在中国，包括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民众向发达国家移民已经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但一个普遍现象是，大多数印度人移民是为了能够省下子女教育费，拉美人士则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而我国的移民当中，约有 80%的人并不是为了离开中国，他们只是为了换取一个身份。在这些人看来，获取收益的最佳地点仍然在中国，而移民则是为了将钱放在一个他们认为更安全的地方。

我们都知道，资本外逃是资本流出中“非正常的”那一部分，其中既包括未被政府准确掌握着的资本流出部分，如出口低报和走私等；也包括渠道未被政府准确掌握着的资本流出部分。

根据央行的解释，一般来讲，资本外逃多是由于经济原因造成，但中国的资本外逃主要是大量腐败分子通过挪用、诈骗等手段携款外逃；同时，一部分企业主对私有财产的保障心存疑虑也成为资本外逃的原因之一。

根据央行发布的《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显示，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目前共有 8 种办法，分别为：现金走私、替代性汇款体系、经常项目下交易、境外投资、信用卡工具、借道离岸金融中心、海外直接收受、借道境外特定关系人。

央行的报告还指出，由于目前中国对一些经常项下的个人支付没有严格的外汇管制或限制，中国腐败分子或其特定关系人常常通过在境外使用信用卡大额消费或提现来实现资金向境外转移。

央行在布置 2012 年的工作时也提出，今年要进一步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甚至，央行首次

将这种监测范围扩展到了人民币的范畴。显然，监管层已经意识到了资本外逃的危害，但令人担忧的是，在急于寻求避风港的各类富人面前，这种监测是否能够起到有效的作用。我们必须看到，资本外逃的手法已经随着监管的日趋严格而变得更加多元和专业化。比如，在澳门的名表店，很多来自内地的游客在购买名表时，往往使用信用卡付账，之后就会以各种理由将表退回，店主则会退给他们现金，而不是取消信用卡交易；而在日本的房地产市场，中国人则多用借记卡付款购房。

可以预见，即使监管者将规定细化到在国外买一碗面也要上报的程度，各种类似于“蚂蚁搬家”的手段也会层出不穷。这就需要我们思考：如何才能让财富持有者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从而把财富留在国内，如何才能让那些腐败分子不敢再将非法收入转移到国外。

(摘自《中国经济周刊》)

多地财政收入“告别”高增长

各地陆续披露的今年首季财政收支数据显示，广东、江苏等经济总量大省及上海、天津、重庆等直辖市的财政收入同比增幅出现较大幅度回落。多数地方财政收入告别高增长，同比增幅回落至 10%左右。

各地财政收入增幅回落

重庆市财政局 4 月 16 日公布今年一季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至此，四大直辖市中除北京外，已全部披露了一季度财政收支情况。统计显示，重庆一季度地方财政收入 706.4 亿元，同比增长 11.3%；与去年一季度同比增长 75.9%相比，增幅回落 64.6 个百分点。上海一季度地方财政收入 1103.7 亿元，同比增长 6.7%；与去年一季度同比增长 37.1%相比，增幅回落 30.4 个百分点。

北京今年开局的财政收入形势或许更不乐观。数据显示，1 至 2 月，北京完成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650.2 亿元，同比下降 2.2%。有媒体报道说，北京市政府有关负责人 3 月底在一次会议上表示，北京市财政收入到 3 月 20 日仍然是下降 0.9%。

与京沪渝相比，天津首季财政收

入实现开门红，但同比增幅仍有不小的回落。统计显示，天津一季度一般预算收入 412.3 亿元，增长 30.1%；与去年一季度同比增长 42.6%相比，增幅回落 12.5 个百分点。

财政收入增幅回落的情形也在广东、江苏、河北、辽宁等经济总量大省发生。数据显示，广东一季度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1392.31 亿元，同比增长 9.70%，增幅较去年同期回落 12.32 个百分点。江苏一季度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1459.64 亿元，同比增长 12.8%，增幅较去年同期回落 18.2 个百分点。此外，辽宁、河北等地财政收入同比增幅也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

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体，多地财政收入告别高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地方税收收入增幅下滑明显。广东今年一季度税收收入同比增长仅 3.48%，远低于去年一季度 22.89%的同比增幅。天津税收收入增幅回落更为明显，一季度仅增长 10.4%，与去年同期增幅相比回落 29.3 个百分点。

对于财政收入增幅大幅回落的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孙玉栋接受《经济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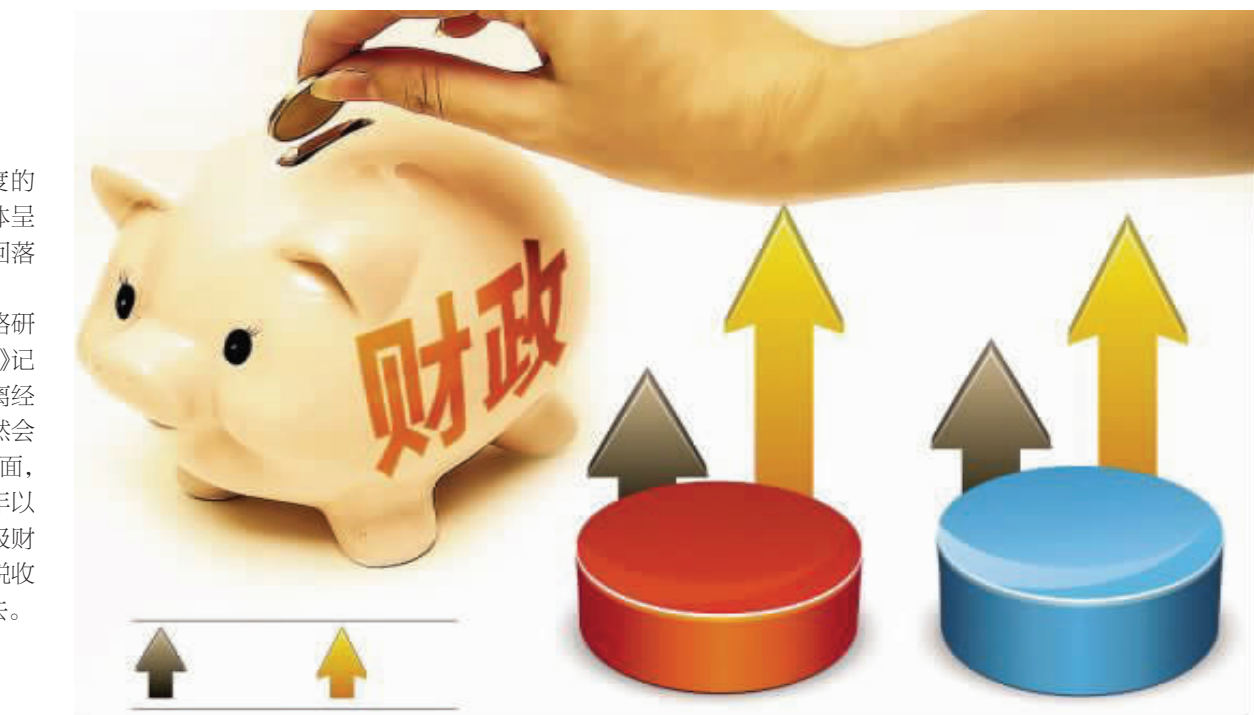
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增速具有相关性，一季度的 GDP 已经说明问题，经济增速整体呈现回落以后，财政收入增幅出现回落很正常。

就税收而言，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一方面，税收不会脱离经济而独立运行，经济增速放缓自然会带来税收收入增幅的下降。另一方面，也有主动减税的因素，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特别关注结构性减税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撑。高培勇认为，我国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不会长期持续下去。

非税收入规模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税收收入增幅明显回落的同时，一些地方非税收入规模迅速扩大，对财政收入增长拉动作用突出。

根据财政部 4 月 13 日公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全国非税收入 4118 亿元，其中，地方非税收入 3472 亿元，同比增加 1158 亿元，增长 50.1%。记者了解到，个别地方非税收入同比增幅超 100%。以天津为例，今年一季度非税收入 130 亿元，同比增加 68.9 亿元，增长 112.6%，占地方一般预算收



入增加额的 72.2%；其中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42.1 亿元，行政性收费 40.7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4.9 亿元。

孙玉栋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非税收入中，只要没有新的收费项目，行政性收费一般不会有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非税收入的拉动因素可能来源于国有企业分红派息增加使得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增长等。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为例，财政部部长谢旭人 3 月 18 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

表示，今年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其中包括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

高培勇表示，随着非税收入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非税收入也会有一个逐步增长的过程“过去不太重视的收入项目现在重视了，制度健全了，那么非税收入的增长可能就会快一些”。

对于未来财政收入的形势，高培勇表示，财政收入会呈现怎样的增长状况，取决于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安排。比如，为推动经济发展，结

构性减税力度会进一步加大，那么伴随减税政策效果的显现，税收增速会下降。

孙玉栋表示，要根据经济增速、物价等指标的变动情况以及税种结构的调整等观察财政收入的趋势，目前来看，财政收入将保持增长态势。他认为，地方政府应理性客观地认识到降低财政收入增速、加大减税空间对经济的积极影响，并抓住机会将经济结构调整得更加合理。

(摘自《经济参考报》)